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二十六期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编者的话：本文有两个分裂的语境，一是党的语境，一是人民的语境。在前一个语境里，为林彪平反是政治，是对现实的考量；在后一个语境里，林彪事件是历史，是事情的真相。

前者，平反权（或裁判权）不属于当年的当事者，当事者只能被裁判；裁判标准也不能再是统治集团的标准，而应是普遍的人性的标准。

后者，要追究历史的是非。而本文的逻辑似乎并不充分：刘、周皆有错，林错无大错，无非各打五十大板；如果刘、周是好人，则林彪不能独获其咎。

而我们要说的是，毛刘纷争与毛林纷争不同。刘挨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六十年代以来逐渐回归理性的务实政策，挑战了毛的权威。刘在这一点上的非毛化，多少接近常识和良知。而毛，不顾中国经济生活的复苏和好转这个得来不易的局面，发动了破坏性的文革。

在那个时期，林对毛的个人迷信运动的推波助澜，则符合了毛的倒行逆施。他创造性地发明了学习毛思想的运动，如宣传“四个第一”，印制毛语录等，和刘拉开了距离。毛林纷争，纯粹是权力游戏的碰撞。林的瓦解，确实使得文革信仰破产。然而，这个历史幽默，不是以林和毛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历史的捉弄。

刘的思想遗产，是他依据常识的著名的判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们不知道林有何正面意义的政治遗嘱和思想遗产。

没有这个基于历史现实的基本判断，历史就会搞乱，就会混淆。

林彪很冤，因为加给他的罪名多是莫须有；林彪不冤，因为他塑造神像时不遗余力，躲避神威时无所作为，对历史、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

本文从林彪事件发端，对文革反思做道德追诘：灾难酿成，人人有责。

在历史上，我们的确看够了人类“美德”干出的勾当。在国家、民族、阶级乃至上帝的名义下，在忠诚、爱国、理想、纯洁、勇敢、热情、奉献这些美好情操的驱使下，人们犯下了事后令自己震惊的罪行。

如果道德可以因地位而异，统治者最高的道德就是夺取并保持权力，被统治者的道德是由统治者提倡的，他们遵从教化。问题在于，被统治者的道德热情甚至比统治者要求的还要高涨，因而犯下的罪行也格外令人发指。黑格尔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

本文的道德价值指向是明确的：尊重人的基本人格和基本权利。无论你是统治者还是精英，无论你有多少天花乱坠的大道理，具备多少崇高的“美德”，都要在这一简朴的标准下受到评判。

在这一标准之下，对林彪的评判不言而喻。

倾听历史的声音——评林彪事件

千秋

林彪的是非，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话题，海内到海外，有很多不同声音，最新的大概就是《重审林彪罪案》。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分歧的话题。我是赞成成为林彪翻案的，不是想为他鸣什么冤，而是多年来过分丑化了林彪，让他承担了许多不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林彪，实际上已被导演成中国传统戏剧中包办一切罪恶的大奸臣。历史应该清楚才能有益，至今林彪的棺盖了，论并没有定。一些问题不弄清楚，对人不公平，对历史不负责，粉饰和篡改历史的结果就是后人永远无法吸取必要的教训。

—

林彪问题的要害，在于垄断历史档案资料。根据需要，断章取义，随意编辑曲解林彪的言行，认为不好的就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好的则略而不提或在动机上做文章。一提到抗美援朝，许多人对林彪的印象就是怯战怕死。有什么根据呢？都来自教科书。一是林彪反对参战，二是林彪称病不接帅印，还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种种绘声绘色的故事。而从现在披露出来的史实看，当时高层的绝大多数都不主张卷入韩战，本来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决策前支持和反对的意见激烈冲突是非常正常的事，不表态或含糊其词才不正常。何况林彪的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没错。长期以来，绝口不提其他人反战，而只突出林彪，又将林彪的反战，归结为他怕美国（实际上当年林彪反战的主要理由，同其他人一样，是认为不符合中国利益），这就不正常了。按传统简单思维，主战的是民族英雄，不主战则是汉奸卖国贼，林彪的形象可想而知。至于林彪不接帅印，有什么奇怪的呢？内战末期他就已病倒，不是中央决定出兵才称病的，建国后他已完全脱离了军队指挥。这样的身心状况，能不能迅速投入一场突如其来而又陌生的大战？当时军中不是没人，林彪也不是假病，为什么就不能推辞？同样称病的粟裕，韩战爆发前一直积极准备对台渡海作战的部署，他也不上朝鲜战场，可从没有哪一本史书斗胆质疑过他的病；太原战役，徐向前最后也将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也是称病。为什么林彪称病就是怯战怕死？

第一次庐山会议，史书也着力渲染林彪的作用。林彪的角色当然没什么光彩可言。问题是，当年的庐山会议上，又有几个人是光彩的？要真正了解庐山会议的真面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原始会议记录全部公开，而不是根据结论需要重点引用林彪的讲话。除了林彪，其他的领导人，都揭发批判了些什么？实际上，林彪对彭德怀的批评，并不严厉，更没有什么一锤定音的东西。他是半途上山的，此时彭的命运已经定了。彭后来的罪名中，比较严重的是路线斗争、反党集团、里通外国这几条，这些不是毛就是刘给他整的，为什么把罪名都安在林身上？林彪说彭德怀：“是冯玉祥式的人物，有野心，想当大英雄”，攻击的是个人品质，不是要害的东西，就象彭德怀自己说的“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一样，属于思想改造不彻底，革命动机不纯的问题。批判可以从严，处理是上不了纲的。况且毛泽东本人也早讲过类似的话。林彪把自己和彭德怀比成丘八，不是治国的料，虽然难听，却也是善意的规劝。庐山会议后，彭林并未结怨，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也

是顺理成章的事，元帅中彭排第二位，林第三位，以这样的资历，加上与毛的历史渊源，不请他当部长才是非常奇怪的事。往往同样的话，同样的事，周恩来做了，那就是出于对领袖的忠心，出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而林彪做了，就一定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

二

参与文化大革命，搅入混水，是林彪一生最大的争议点，在这场祸及苍生动摇国本的血腥权斗中，林和周都是毛泽东整倒刘少奇帮派的最重要帮手。

但有几点应该加以分辨：

一、文化大革命，源于毛刘的最高权力斗争。传统体制下国无二主，“二日并行”的结果必然是“火星撞地球”。毛刘冲突的起因和整个发展过程与林无关，林彪只是在中央激烈斗争爆发后，才跟着毛泽东上了文革的贼船。文革不是因林彪而起，也不会为林彪而止。林彪不知道也决定不了文革的大方向和目的地，这一点他与周恩来处境相似，作用也相似。

二、毛泽东与林彪，是战争年代长期共患难的直接上下级。从井冈山时代起，林彪就一直紧跟毛泽东，林所率领的武装，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无论历史上毛怎么顺逆起落，林敢于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却从未背叛陷害过毛泽东，也没有居功自傲，拥兵自重向毛泽东要过什么价。而历史上的毛泽东，也从未亏待过林彪，这种长期的上下明显而又相互信任的关系在中央最高层中无人能比，不是“投机”、“欺骗”所能解释得了的。林在文革权力斗争中跟毛走，同他过往的历史轨迹相一致，绝不是所谓的想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篡党夺权。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毛泽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林彪没有怂恿毛去整什么人，也没资格为帮毛打倒什么人而要价。所谓“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说法不可信。就如林彪与贺龙如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黄永胜几乎肯定会帮林彪一样，战争中形成的上下级关系有坚实的感情和利益基础，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利益交换，林彪之于毛泽东，也不例外。倒是如果是刘少奇林彪联手的话，背后肯定有重大的利益交换。

三、由于文革前刘少奇帮派已大致操控党的各级组织，毛泽东要夺回全党控制权，就得考虑非组织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的军队作为毛倚重的基本力量，不可能不介入斗争。正因为毛泽东需要武装部队在非常时期起非常作用，这时候的毛是希望林彪在军中畅通无阻的。有毛林关系这种大气候，罗瑞卿与林彪的矛盾就显得很不合时宜。罗的越权和跋扈不是一天两天，对他不满的人也多得很，但没文革就不会有事，林罗矛盾互相牵制有利于党管军队。但文革前夕，在毛泽东倚重林彪的情况下，林罗矛盾会不会被刘少奇所利用？拿掉罗瑞卿是毛泽东必须下的一个政治决心。林彪敢向毛托出罗瑞卿的问题，也是为毛着想，怕到时候动用军队不便。这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绝不是什么要挟交换，谁敢要挟毛泽东？林是毛几十年的部下，要挟他能有什么好下场？

四、林彪在文革中，真正势力范围只限于军中，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各项具体措施政策，主要依靠中央文革小组来推行，林彪的作用是以实力作毛泽东后盾。后期的部队支左和军管，也冲击社会，但客观上有稳定局势的作用。林彪同周恩来，对文革权力斗争中造成的大批高干冤案，有较大的责任。中共历史上历次权力斗争都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管胜负，不管对错，整人整到底，林彪这方面应该是尽力的；但对国家的动荡人民的苦难，因为权力斗争采取群众运动，这方式是毛泽东的专利（虽然人民实际上没有任何决定权，但这种参与容易给历史造

成错觉：打倒刘少奇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林周即使不同意也只能跟着哄，而且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凌驾一切，林周责任较小。林彪、周恩来对文革，也就是把它当成一场权力斗争来看待，而刘少奇被斗倒之后，他们也理所当然地以为毛泽东该收拾残局，结束动乱，让人民休养生息了，对毛泽东下一步往哪里去，他们心里也没底。如果要追究文革中严重动乱和打砸抢犯罪行为的责任，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

五、从文革兴起到高潮，军队始终在林彪管理之下，属毛泽东信得过并随时准备充当打手的一支力量，毛泽东希望天下大乱却不敢军队也乱。这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激烈动荡的中国，军队保持着相对的稳定，造反派的野火始终没有全面烧进解放军，军中也始终没有像社会各地一样，形成造反派这样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虽然也有清洗和力量重组，但你方唱罢我登台的都是那些老山头派系，而他们与新生的文革势力之间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江青张春桥在军中无可借重的代理人，林彪比较有效地拒绝了江青把手伸进军队乱搞。即使林彪倒了，四人帮也无法找到现成人马来填补军队中的真空，这是他们致命的弱点。

六、林彪的出逃，惊天动地，是文革从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不管情愿与否，也不论成功失败，面临迫害，林彪在最后关头与逆来顺受的高岗彭德怀刘少奇等人不同，他用行动公开宣布与毛泽东决裂。毛遭此突变进退失据，短时间内不得不大量起用老干部来稳定局势，埋下后来文革翻盘的种子。“九一三”也使毛泽东神话彻底破产，毛林关系顿成全国人民的大笑柄，大家批判的是林彪，腹诽的实际上是毛泽东，这一点，毛心里有数。林彪破了毛泽东的局，打乱其整人步伐，毛林冲突的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

三

“林彪事件不是案，那是一段历史。”从不同的需要出发，对林彪的平反，也存在三种不同的层次。

首先，对林彪家人及一大批受林案牵连的人来说，这确实是压在他们头上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中国人都知道这罪名的份量，我们都是过来人。几十年来他们已深受其害，他们希望解脱，他们要求重审，这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就林彪罪案本身来说，其核心是谋反，即林彪是否涉及谋杀毛泽东是问题的关键。即使在封建社会里，谋反（当然是不成功的谋反了）也是最大逆不道的罪过。如坐实这个罪名，任何当权者都不敢随意为林彪翻案，而如推翻这个罪名，所谓毛泽东“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也就子虚乌有了。

第二，对党来讲，林彪事件是政治。要不要为他平反，什么时候平反及平反到什么地步，涉及文革的历史，毛泽东的责任。随着文革的远去，平反林彪给社会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少，但这种政治上的平反只能是个姿态，甚至可能是闹剧。林彪如果也象其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重塑金身，拥入圣堂，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生前仇敌喜气洋洋地欢聚一堂，又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第三，对人民来讲，林彪案件是历史，人民需要了解其中的真相。

在林案及其他许许多多问题的争论上，中国人对历史，缺乏探究的执着和面对的勇气，这导致复杂历史问题简单化概念化，妨碍我们的反思。把文革的罪恶错误都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就是这种表现。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几乎没有歇过。何谓运动？说白了，就是整人。根据需要，一批人冲锋陷阵刺刀见血地去整另一批人，还有一批人在争当啦啦队担架队后勤队。这里面，有党员有干部，更有大批的平民百姓，是“暂时做稳奴隶地位的人”全身心投入地整“欲做奴隶而不得的人”。不同运动不同需要，不同派系不同层次的群体就交替充当不同角色。劫波过后，还有什么？我们收获仇恨，我们伤痕累累！大家这么折腾，除了一本血泪账外，难道就没有其他更宝贵的经验教训吗？

什么是受害者？现在人人都说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刘少奇是受害者，林彪也是受害者；老干部走资派是受害者，工人造反派也是受害者；老师是受害者，学生也是受害者。不同的只是时间、程度和方式。人人有权控诉，人人有东西声讨。但是也别忘了，当年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也都参与助长了错误和罪恶，在历史面前，我们都是有罪之人！林彪是害人者，刘少奇又何尝不是？文革初期派工作组进大专院校，迫害学生压制异己，手段之残酷，完全是反右的翻版，而现在又有谁关心那段短暂的历史？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的走资派和文人，当年反右中又多是急先锋，害人者。他们被害时，是可怜无助悲惨哀怨，可他们害人时，也是睁眼说瞎话，没有过温情，也没有过犹豫。我们不把这看成报应，但这确是不能抵消更不能掩盖的两面。

当年许多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早期头头，现在多已子承父业，当上了“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甚少回顾自己的峥嵘岁月。偶尔谈起，也都文质彬彬，他们所描述的文革历程惊人的相似：他们为理想而参加红卫兵，他们在文革中受尽迫害，他们从没打过人，他们一贯反对暴力，他们对敬爱的老师被打死感到震惊，他们从此反思文革并最终觉醒。

我不敢完全轻易否定他们的回忆，我只是觉得，这情况与文革初期干部子弟曾担负的重要历史使命是不相符的。众所周知，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是从城市向农村扩散，而在城市，是从高干子弟聚集的重点学校向一般学校扩散的。早期的红卫兵组织，都掌握在高干子弟手里，只有“红五类”才有资格加入，不是谁都可以到社会上打砸抢的。一般的平民百姓子女，特别是在好学校念书的孩子，就是想打老师，也不见得有这个胆量呀（当然经过文革初期打人热身后，革命小将的胆量另当别论）。手眼通天胆大包天的高干子弟的角色，不是白痴都想象得出来。文革初起，高干子弟是领头羊，他们是在带领群众完成文革热身的神圣使命后，被伟大领袖所抛弃的。

高干子弟们后来都觉醒了，他们知道的内幕多，觉醒得彻底，这是事实。但他们的觉醒起因于文革矛头的转向：原来真正的目标是他们的父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开始被抄家，他们开始挨斗，他们流离失所，他们不再优越，他们也落入他们曾经歧视的共和国贱民行列，正如毛主席教导的：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这时候，他们开始痛苦，他们开始震惊，他们开始反省，他们才开始否定文革！

五

高干子弟们如此文过饰非，那文革普通的参加者呢？大同小异。想当年，许多人怀着无比激动无限憧憬的心情参加文革，而青春耗尽之后，整整一代人一无所有。在历史面前，我们有多少教训需要借鉴啊！这方面好的文章不多，绝大多数人总是在下一代面前强调甚至炫耀当年自己的纯洁和富有理想，仿佛一切的罪

过都是因为太纯洁太有理想了（所以他们才特需要林彪、四人帮作替罪羊）。

真是这样吗？文革中的一些行为（像打老师毁文物，揭发批斗甚至诬陷自己亲朋好友的人类劣性大展现），违背了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不是仅仅靠“纯洁善良”、“青春热血”、“革命理想”、“激情燃烧”这些漂亮的词汇就能解释得了的。如果这也算纯洁，那还有什么叫愚昧？如果这也算激情燃烧，那变态又算什么？

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很特殊的一代人，特殊的政治环境、特殊的教育、特殊的经历，塑造了特殊的品质。这一代人兴趣单一，关心政治，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热情，这当然也不是致命的缺点，但有这样众多的干柴，邪恶的星星之火的确很容易燎原。

青年人总充满活力，也充满野心。一个正常的年轻人，会追求新奇刺激，也希望爬上社会的相对高的层次。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吸引年轻人的娱乐活动，这个社会迟早变态；如果不能把有能力的年轻人都选拔到适当的位置上，这个社会迟早动荡。科举制度为什么在中国会延续这么长时间，占那么重要的地位？古代科场弊案，为什么要处理得那么重，朝廷命官也常常问斩？其实说白了，都是“稳定压倒一切”。封建社会，只有这科举制度是唯一真正平等的用人制度，无论贫富贵贱，考卷面前人人平等。肯努力就有希望。人民需要这样的制度，虽然路很窄但相对公开公平公正；国家也需要这样一个机制，把不满现状而有才华的年轻人的精力都耗费在这上面。考场作弊，动摇天下士子信心，破坏国家安定团结。

建国以后，对青年人的要求与以往不同，无论你要娱乐还是要上进，都得“讲政治”。你要娱乐吗？斗人吧：“与人斗，其乐无穷！”检举揭发批判批斗，检查检讨认错认罪，面对面，背靠背，从小说电影到现实生活，斗人实际上成了中国人当时最价廉物美的娱乐节目，人们的道德神经已经麻木。不斗白不斗，斗了也白斗。你要往上爬吗？政治挂帅。重出身，也重政治表现，只有在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才可能有个人的前途。建国后的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教导年轻人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年轻人投机也好，好玩也好，参加文革并有种种恶劣行为，一点都不奇怪。他们的动机可以理解，某些人是寻求刺激，把折磨别人当免费娱乐；某些人是不甘久居社会低位，看准文革乱世机会，积极表现想以此爬上高位。当然会有某些理想主义、个人恩怨的因素掺杂其中，但根本不占主要地位。

说到底，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是最悲剧的一代，他们曾经冷血，对别人冷血，对自己也冷血！他们苦，让别人受苦，自己更苦！明白这一点并勇敢地讲给下一代听，非常重要。

六

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确实史无前例。特别是在有尊师重教传统的中国，竟会有这么一天，教师们集体被自己的学生肆意戏弄侮辱以至打死，谁能想得通啊！我们在同情这些老师的时候，也真诚希望老师们回忆一下，当年斗他们最起劲的学生，可都是“红五类”的学生，他们也是文革前，最受学校关爱照顾的一群人，是重点培养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啊！

在西方社会，不允许孩子虐待一只猫一只狗，因为这代表冷血和变态。而我们的好学生，当年竟能脸不红心不跳地折磨凌辱自己的老师、长辈，并以此为乐以此为荣，这不是一般的变态，也不是个别的变态，整整一代年轻人在疯狂。这是偶然的吗？它应该有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解放后，整个社会就在无所不

用其极地虐待各种“阶级敌人”，一点良心道德底线都没有。家长、老师没有给学生们设置这样的底线，“史无前例”的学生当然做“史无前例”的事。社会如此疯狂，学生已经如此病态，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林彪、四人帮这几个人身上？

今天的教育界人士在反思文革时，不应该只是哭诉，而要通过自己的惨痛经历，唤起人们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反思，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让孩子远离仇恨，让下一代对社会多一些包容之心博爱之心，那才是真正有大智慧大勇气的表现！也更有现实意义。当然，我绝不反对控诉和追究文革暴行的领导人责任，但过分强调某些人的责任，反而会妨碍对整个体制和国民素质问题的探究，而且这也确实不符合历史。

此外，中国人，无论海内海外，论起新中国的悲剧，多把视线集中于两大焦点：反右与文革。为什么中国人对文革、反右特别痛心而对镇反、三年大饥荒的罪过相对麻木？答案很简单：因为文革的打击对象是走资派，是官僚阶层；反右的打击对象是知识分子，是士的阶层——他们的生命高贵或自认为高贵！按中国人的观念，这两个运动摧毁了国家的领导力量和精英阶层，严重破坏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从国家的损失来讲，他们的严重程度自然压倒其他。而大饥荒虽然饿死几千万人，大镇反虽然枉杀了几百万人，但那都是农村的贱民，社会的渣滓，他们死不足惜，不影响祖国乘风破浪的发展速度。中国人有爱国的光荣传统，评价灾难，也以国事为先，民以君为天，情为君所系，元帅受难了，老革命死了，大知识分子自杀了，那是“我们党和国家无法估量的损失”！老干部被抄家了，浩劫啊！许多人为他们的悲惨遭遇洒泪痛哭。而大批农民饿死呢？那只是一个可忽略不计的百分数，农民“易子而食”还抵不上领袖不吃红烧肉的痛苦。

要不要改变这种观念？什么时候才改变这种观念？国家主席是人，开国元勋是人，农民也是人，人人生而平等，生命都是最可宝贵的！谁死了对他自己和家人都是浩劫！三千万人的浩劫就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浩劫！不能等到老干部被抄家批斗，高干子弟流落街头，学生打死老师，知识分子被游街时，才认为是浩劫。老师不该打，那资本家呢？地主婆呢？天主教神父呢？该不该用如此暴力的手段摧毁他们？该不该剥夺他们在公众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权力？每一个想真正反思文革的人，都需要认真思考并回答这个问题。

七

文革后曾有过一个诱人的口号，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许多知识分子深以为然，认为是对文革、反右等运动“深刻反思”的结果。文革、反右等运动，根本就不是什么尊重不尊重知识，尊重不尊重人才的问题，而是尊重不尊重人，尊重不尊重自己国民的基本人格基本权利的问题！他就是没有知识，不是人才，他也有做人的权力！你不能这样对他！这些运动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肆意践踏人权，随意侮辱人格，对国民党反对派这样，对民主党派这样，对党内曾经共患难的战友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甚至还更狠。

马寅初的遭遇说明什么？是因为没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吗？当初有谁保证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是正确的？与他意见相左的专家学者大知识分子特大知识分子多得很！知识分子不需要特别尊重，也不应该受特别尊重。当年的马寅初，只需要一个正常人的基本权利，争鸣的权利，不被强迫改变思想的权利。批判马寅初的运动本身就是错的，这与他的理论有没有价值、是不是正确毫无关系。换

句话说，即使毛泽东的人口理论对了，他动用国家资源专政手段来压制迫害异己的方法也是遗害无穷的；而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即使今天被历史证明完全错了，他为捍卫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理论，不惜孤身一人单枪匹马，与不以理服人、专以势压人的国家势力周旋到底的精神，也光照千秋！

什么时候大家都清醒了，中国才有希望。

（本文由读者荐自网上，作者情况不详）

更正：二十五期《卜占亚上下“贼船”记》中提到原湖南省副省长“章伯钧”应为“章伯森”，特此更正并向作者及读者致歉。